

艺界观察

从《定军山》到《云雀叫天录》——

谭门七代，一脉相承

本报记者 刘源隆

天乐园戏楼立在北京前门鲜鱼口已有200多年了。梅兰芳在此出道，程砚秋在此成名，这里见证了中国京剧的发展。前不久，它等来了电视剧《云雀叫天录》看片会。该片正是取材于“伶界大王”谭鑫培的故事。散场后，谭正岩从后台走出来。他是谭门第七代嫡传人，在这部剧里既做艺术指导，又出演了一个角色。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父亲谭孝曾是这部剧的艺术总监，但他今年77岁了，所以我得顶上。”



谭家六代人在《定军山》里的“黄忠”形象。受访者供图

“无声不谭”，敢为人先

2027年是谭鑫培诞辰180周年。在京剧史上，谭鑫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无声不谭，无腔不谭”这句话流传了100多年。他是京剧谭派老生艺术的创始人。谭正岩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到一个细节：谭鑫培当年把京剧从“音量美”转向了“韵律美”。早期京剧讲究嗓门大，但从谭鑫培开始演人物、唱味道，不再一味追求音量。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但谭鑫培没有动摇，他坚持自己的艺术判断，最终开创了京剧第一个流派，也让观众从听“响”转向了听“味”。

这份不守旧、敢尝鲜的劲头，不只体现在戏台上。1905年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时，谭鑫培已年近花甲。他没有把自己困在戏园子里，而是走进照相馆，面对一台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洋影戏机”，将表演记录下来。谭正岩说起先祖拍电影的事，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笃定：“如果他是个保守的人，他不会去拍。”

这种“不保守”像是写进了谭家的血脉里。谭家七代人，有五代与影视结缘。1933年，谭富英拍了中国第一部有声戏曲电影《四郎探母》，轰动一时。谭元寿主演了京剧电影《沙家浜》。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谭元寿出演故事片《定军山》，扮演的正是自己的老祖谭鑫培，而其中配唱的便是谭孝曾。谭孝曾还出演过《红灯记》《平原作战》等影片。

谭正岩也在不断“尝鲜”。他是北京京剧院最早尝试直播的演员之一。他说，希望通过不同的平台展现京剧之美，让更多年轻人先接触、再了解、最后喜欢上戏曲。

在谭正岩看来，谭家每一代人身上都有这种创新的基因。“如果谭鑫培活到现在，肯定不会按照100年前那么唱。”谭正岩说，“守正但不守旧，只有创新才能与时俱进。”

光影新声，戏韵长鸣

《云雀叫天录》是京剧艺术在当代传播的又一次尝试。该剧剧本前后打磨了12年。看片会上，总制片人李基业介绍，开拍前，演员提前数月进组训练，不只学戏，还要观察伶人的一举一动，体悟他们的精气神。编剧王要说，他最先被谭鑫培的人格魅力打动，又被京剧艺术独特的美学形式深深打动，于是决定把京剧美学和人物魅力结合起来。

“剧中‘叫天’二字，对我们谭家有着特殊的分量——高祖父当年的艺名正是‘小叫天’。”谭孝曾说，谭鑫培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几出戏、一个流派，更是一种精神。这部剧用今天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老辈艺人的风骨、梨园行的生态与时代变迁讲给更多人听，是对京剧的一次有力传播，更是对谭鑫培的深情告慰。

据了解，剧中涉及276个京剧唱段，均由知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配唱。谭正岩在剧中客串了一个角色，同时全程跟组指导。在他看来，京剧与影视的融合，最难的就是分寸感。这个分寸感，首先体现在服化道上。他特别提到，该剧在服装、化妆上没有完全复古，也没有为了好看而随意改动，“既要让观众接受，又不能丢了那个时代的味道”。分寸感也体现在表演上，谭正岩说，京剧是程式化艺术，一板一眼都有规矩；到了影视里，只知道台词和环境，剩下的全凭自己拿捏。正是在影视跨界实践里，他才看清了生活中的伶人是什么状态。这个分寸感，说到底就是既不能丢了京剧的根，又要让镜头前的人活得真实。

如果说做直播、拍影视剧跨界，是想把不熟悉戏曲的观众“引进来”，那么作为北京京剧院谭派艺术研究所所长，谭正岩这些年也一直在为戏迷做另一件事——整理家族留下来的音视频和文字资料，挖掘整理谭派老戏。有些戏流传下来已经不完整了，他就和父亲一起想办法修改补全，重新搬上舞台。

守正不移，薪火不息

在整理这些老戏和资料的过程中，谭正岩越来越觉得，谭家七代嫡传没有断档，靠的不光是传艺，还有做人。从谭志道、谭鑫培到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再到谭正岩，一部家族史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京剧史。“唱戏要高调门，做人要低调门”是谭正岩从小听得最多的教导。这话听起来朴素，但在一个七代不缺角儿的家族里，做起来并不轻松。

谭正岩记得，有一回练功之余，他打了两局乒乓球，被人拍了照片发到网上，有评论说他“不务正业”。这话传到爷爷谭元寿那里，爷爷把他叫到家里，问他：“你现在练不练功？给你一个礼拜，我要看你的《八大锤》。”那是谭正岩上学时唱红过的一出戏，对腿功要求极高。爷爷的意思很明白——你不是被人说“不务正业”吗，那就拿真功夫说话。

2005年，谭正岩参加第五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拿了老生组金奖。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掌声，而是铺天盖地的质疑。谭正岩说：“很多人说这是给谭家打的分，不是给我打的。”那段时间，他几乎被骂声淹没。最严重的时候，他写好了辞职信。但他想起爷爷的教导，既然受到质疑就用舞台上的表现说话。“现在回想，如果当时我真放弃了，谭家传承断在我这儿，我哪有脸去见先人啊？”谭正岩说。

2020年，孩子出生、爷爷去世，那是谭正岩压力最大的时候。“不再是挨骂的压力，是真正考虑传承这件事的压力。”如今，谭正岩的儿子刚上小学，在谭家班暑期夏令营体验了7天，居然就能唱了。谭正岩说，孩子第一次上台那天，他抱着儿子走到天乐园戏楼一楼大厅谭家几代人的照片前，对着爷爷的照片说：“爷爷您看，您重孙也扮上了。”一边说，一边眼泪就下来了。他坦言自己内心矛盾极了，一方面希望孩子接班，一方面又心疼他，“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有多辛苦”。

看着儿子，谭正岩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说，传承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得一直往前跑。直到看见前面有人接棒了，就把接力棒传给他，然后下一个人继续往前跑。



电视剧《云雀叫天录》海报。受访者供图

致敬峥嵘岁月 凝练审美哲思

——评原创曲艺剧《红军花》

罗 群

在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的舞台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迎接建军百年而创作的原创新曲艺剧《红军花》与观众见面，收获了掌声与喝彩。当几块竹板、一面大鼓在安徽合肥大剧院的舞台上铿锵作响，当长征沿途9种曲艺形式在同一个叙事空间里交相辉映，《红军花》完成了以曲艺表现红色题材、讲好中国故事的舞台实践，也走出一段坚守曲艺本体特征、拓展曲艺美学边界的探索之旅。

曲艺来自民间，深受观众喜爱。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在新的舞台条件下放大曲艺的个性魅力，同时不伤其质朴真味，使得曲艺的本体特征得到充分守护与张扬，是个值得思考的课题，《红军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红军花》分为《喇叭声咽》《雄关漫道》《大渡桥横》《万水千山》《红旗漫卷》5个篇章，江西鄱阳大鼓、评书、广西文场、对口快板、贵州琴书、小品、四川谐剧、群口快板、四川竹琴等多种曲艺形式自然贯穿其中，既在思想内容方面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相契合，穿针引线、烘托点染，又在艺术表达方面充分尊重曲艺的特点和规律，沉郁苍劲与悠扬婉转各美其美，个性突出、气韵生动。而剧作整体的思想容量、故事架构等又强化了单个曲艺节目的感染力，丰富了单个曲艺节目的内涵，达到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圆融之境。

本体特征必须守护传承，而表现题材自当与时俱进。在以往印象中，人们常常认为曲艺擅长表现家长里短、日常温情，这固然没错，但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曲艺驾驭宏大题材、承载理想情怀的能力。实际上，从唐代变文讲唱历史故事到宋代说话演绎天下兴亡，再到近代尤其是现当代曲艺名家心系家国大义，曲艺、曲艺人从未将自身局限于柴米油盐。在这个意义上，《红军花》向历史致敬、向时代致敬，亦是向自身深厚、光荣的传统致敬，还是对曲艺叙事抒怀领域、内容题材的进一步拓展。“大娘十里追针”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活报剧排练”凸显了四渡赤水之惊心动魄，“爬雪山过草地”“饥饿中吃鼓皮”等情节表现了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宏伟气魄……《红军花》通过小人物的视角和故事表现长征，以曲艺说唱再现并致敬伟大历史，几块竹板、一面大鼓，自有气壮山河的雄浑、一往无前的担当。

眼光从宏大历史聚焦到具体作品，《红军花》在艺术上的探索与突破同样值得注意。有学者表示，交叉融合、边界模糊是当今艺术的共同特点，其背后是整体文化生态的沿革，源自当今社会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的深刻转型。当代观众能够轻松便捷地通过多种媒介形式获取不同的文化娱乐享受，新媒体、新技术也催生了全新的审美接受环境、消费场景。市场和观众对传统的艺术形式抱有新期待，是从从业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曲艺与戏剧的结合并非新鲜事，然而以往不少尝试要么以戏剧为主、曲艺为辅，沦为“话剧加唱”；要么机械地理解和强调曲艺的说唱特点，拒绝戏剧结构的内在要求；还有的几乎就是让戏剧情节为“耍贫嘴”服务，严重降低曲艺剧的艺术格调。以上种种皆不足取。《红军花》的出色之处，恰在于让曲艺与戏剧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让戏剧结构成

为坚实的骨架，让曲艺唱段成为有机的血肉。四川谐剧《跟你走》以一人独演的假定性，契合了渡口边个体命运的抉择；群口快板《飞夺泸定桥》以密集的节奏，展现军事行动的紧迫感；贵州琴书《穿针引线》以细腻的抒情，为“大娘十里追针”的军民情谊提供情感的容器，为观众的情感共鸣提供戏剧的“端口”……《红军花》中的曲艺节目在适宜关头自然发生，恰到好处，无斧凿之迹。

在《红军花》中，曲艺节目没有被稀释为戏剧的附庸，戏剧也没有被打断为曲艺唱段的串烧，曲艺和戏剧在彼此对话的空间中生出一种“曲艺的戏剧性”和“戏剧的曲艺性”。在理论层面，这是曲艺美学传统与艺术表现的守正创新，其内涵、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在实践层面，曲艺找到了一种既能延续自身特色，又能回应现代观众审美习惯的精彩有效的表达方式，为曲艺进一步走向市场、走向年轻人、融入当代社会生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当代从业者创造舞台、为曲艺的当代传播打开空间、为艺术品种的未来发展培养知音，其间的重量不言而喻。

《红军花》的剧名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意象：红军草鞋踩过的地方长出无名的花朵，那是草鞋上带来的种子，生命力顽强，开花结果。从泥土里生长出来最终传遍祖国大地的，除了伟大的革命理想信念，还有生生不息的曲艺。曲艺不仅记录历史、表现历史，其本身就是宏大历史的一部分。曲艺与其表现对象之间的微妙同构，亦是《红军花》留给人们的一个意味悠长的启示，从中汲取智慧，有利于走好曲艺发展的路，走好文艺事业的路，走好新的长征路。

光影舞台



▲▲ 演出现场。



重庆话剧院版话剧《谁在敲门》近日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上演。

话剧《谁在敲门》改编自四川作家罗伟章的长篇小说。该剧以一个川渝乡村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数十年来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演出中，细腻真实的舞台演绎、烟火十足的乡土故事、直击人心的亲情内核，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

据悉，该剧自面世以来，凭借过硬的品质收获了专业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剧目此前已完成重庆、四川成都、浙江杭州三城的多轮巡演，累计观演人数超1.6万人次。

本报记者 祝 静/文
演出方供图

▲ 观众在剧场拍照留念。

